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 实践与启示*

——以1956年中巴两国总理互访为例

李潜虞**

【内容提要】 自1951年5月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并不顺畅，原因主要在于巴基斯坦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两个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反华军事同盟。尽管如此，中国仍按照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原则发展与巴基斯坦的睦邻关系。1956年10月，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访问中国；同年12月，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在访问中周恩来反复强调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国内建设；中方将不介入克什米尔问题。中巴两国总理的互访成为中巴关系逐渐改善的开端，也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实践，并对其后及当前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中巴关系；冷战；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地缘政治安全；外交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 D829.3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508 (2022) 04-0039-18

DOI: 10.13252/j.cnki.sasq.2022.04.03

自1951年5月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以来，中巴关系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发展并不顺畅，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巴基斯坦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并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面对巴基斯坦这样一个同时参加了两个反华军事同盟的陆路邻国，中国不但没有对巴基斯坦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冷战时期中国对亚非国家统一战线政策研究”（18BDJ069）的阶段性成果。

** 法学博士，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进行批评和反制，反而主动采取措施，有效推动中巴关系发展。1956年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总理的互访就是中国发展与巴基斯坦关系的重要行动。中国学术界对于1956年中巴两国总理互访这一重大外交行动鲜有涉及，更没有对这次互访所带来的外交战略和思想上的启示进行深入阐述和研究。^①本文拟依据中方资料并结合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外交档案，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发展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实践，特别是1956年中巴两国总理的互访进行系统的论述，探索在全球冷战背景下，中国如何以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指导周边外交政策，积极影响一个参加对抗性军事同盟的重要邻国，使之最终成为中国的持久友好邻邦，以及这一政策对中国外交战略所产生的启示意义。

一、建交初期的中巴关系：矛盾与共同利益

1951年5月21日，中国与巴基斯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巴建交之后，双边关系虽然在经贸和文化领域有所发展，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面临着严峻的障碍。当时中巴关系的主要障碍在于巴基斯坦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并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在美国的唆使下，巴基斯坦还反对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另外，当时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倡导亚非国家走和平中立的道路，得到了中国的赞赏与肯定。但巴基斯坦极力反对亚非国家走和平中立的道路，为自己加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军事同盟进行辩护。

1954年5月19日，巴基斯坦与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务援助协定》。协定签署后，美国开始向巴提供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1954—1956年期

^①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于1956年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总理互访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将此次互访作为新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史的一个细节进行极为简要的论述。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31—133页；林良光、叶正佳、韩华：《当代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5—126页；杨翠柏、刘成琼：《列国志·巴基斯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53页；郑瑞祥：“传统友谊的新发展——论建交35年来的中巴关系”，《南亚研究》，1986年第4期，第3页；陆树林：“中巴关系：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典范”，《当代世界》，2004年第6期，第12页。第二个类型是将此次互访作为一个例证来证明周恩来个人的外交风范对中巴关系的贡献。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裴默农：“从中巴关系看周恩来争取友好邻邦的远大谋略”，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13—114页；耿飏：“新中国外交的光辉旗帜”，田曾佩、王泰平主编：《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5页；韩晓青：“周恩来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巴关系根本改善的奠基性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第95—98页。

间，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援助总额就达到了13亿美元以上。^① 巴美结盟之后，巴基斯坦于1954年9月8日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该组织是美国主导的、旨在遏制和封锁新中国的军事同盟。1955年9月23日，巴基斯坦又加入了由英国、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等国组成的另一个集体防务条约组织，即巴格达条约组织。这样，巴基斯坦成为了中国陆路邻国中唯一一个参加了两个反华军事同盟的国家。

中国虽然对于巴基斯坦参加两个反华条约组织有所不满，但中国的具体做法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1954年10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妇女代表团时表示：“中巴两国是友好的，但是巴基斯坦竟参加了敌视中国的集团，这使我们很难过。”周恩来还以换位思考的方式来阐述中国对巴基斯坦此举的不满。他说：“巴基斯坦希望中国了解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感情，那么巴基斯坦为什么不了解中国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感情呢？”^② 周恩来委婉地表达了中国对巴基斯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不满，可见，中国对巴基斯坦参加反华军事同盟采取的是比较克制的态度。

此后，巴基斯坦又在美国的唆使下，企图让亚非会议的东道国做出不邀请新中国与会的决定。1954年12月28—29日，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举行会议，商讨召开亚非会议的问题。当年12月24日，美国国务院曾致电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要求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能在茂物会议上强烈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会。但由于电报到得太晚，阿里已经动身前往茂物。12月26日，在他经过曼谷时，美国驻泰国大使馆向他转达了美国政府的意见。12月27日，在阿里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又立刻向他转达了美国的要求。^③ 茂物会议开始后，阿里果然提出了反对邀请

^① 林良光、叶正佳、韩华：《当代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

^② 韩晓青：“周恩来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巴关系根本改善的奠基性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第95-96页。

^③ Outgoing Telegram from Department of State to American Embassy, Karachi, No. 843 and to American Embassy, Bangkok, No. 1604, 24 December 1954; Incoming 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Karachi to Department of State, No. 855, 26 December 1954; Incoming 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Bangkok to Department of State, No. 1385, 27 December 1954; Incoming 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Djakarta to Department of State, No. 996, 27 December 1954, RG 59, Department of State Decimal File, 1950-1954, Box 2978, National Archive II, College Park, MD.

新中国与会的建议，但是遭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坚决抵制，最终不得不同意邀请新中国与会。^①

虽然巴基斯坦在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中持反华的态度，但并没有阻止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与巴基斯坦代表团打交道。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会晤了阿里，深入分析了巴基斯坦与美英结盟给中巴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周恩来说：“其一是巴参加美国拼凑的矛头指向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国对此是不满意的，但是为了友好，我们没有公开指责巴基斯坦。其二是巴跟着又参加了受美英支配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巴参加这两个条约组织使自己在亚洲处于难堪的地位。其三是巴还同美国签订军事协定。这不仅对巴不利，也使我们感到不安。”^② 周恩来虽然表达了对巴基斯坦参加反华军事同盟的不满，但仍然对巴基斯坦展现出善意。周恩来对阿里说：“我们不具有侵略性，来中国看看吧，看看中国是不是具有侵略性或正在进行侵略的准备。”^③ 周恩来坦率的交流赢得了阿里对中国的理解。他郑重声明，巴参加两个条约组织和它同美国签订的军事协定完全是为了防御邻国的侵略，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他还庄严保证，如果美国发动侵略战争，巴决不参加。^④

中巴之间的第三个分歧是由于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与印度的对立，巴基斯坦不支持走和平中立的道路，对于由中国、印度、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持反对意见，并竭力为巴基斯坦参加西方国家主导的军事同盟进行辩解。1956年12月9日，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在达卡大学发表演讲，阐述了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他表示：“如果巴基斯坦采取中立的政策，那两大阵营都会无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寻求与西方建立联盟是正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里的每一项原则都可

①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 第八卷：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39—240页；“茂物会议情况”，1954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207-00002-04（1）。

② 裴默农：“从中巴关系看周恩来争取友好邻邦的远大谋略”，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12—113页。

③ Foreign Service Dispatch from American Embassy, Karachi to Department of State, No. 715, 7 May 1955,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55-1959, General Decimal File, Box 2670, National Archive II, College Park, MD.

④ 裴默农：“从中巴关系看周恩来争取友好邻邦的远大谋略”，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

以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中找到。”^①

中巴关系虽然面临着一些障碍，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巴关系仍具有向前发展的基础。首先，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曾经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对于对方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都给予了极大关注。1954年10月18日，周恩来在一次内部报告中谈到亚洲国家时表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统一战线更强一些。不仅是在和平问题上，还由于他们过去和现在同样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还有民族感情。”^② 相同的历史遭遇使得中国和巴基斯坦相互理解，两国关系具有一定的感情基础。

其次，中巴两国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国内经济建设。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国民经济基础比较差，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援助来维持国家经济生活的运转。实际上，巴基斯坦一直渴望能够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经济建设，从而不再仰人鼻息，获得国家尊严。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中期，朝鲜战争刚刚停战，中国开始了一个进行经济建设的历史阶段。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同一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战略的最主要目标就是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第三，中巴两国的经济关系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棉花是巴基斯坦的主要出口产品，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国和印度对巴基斯坦棉花的需求锐减，这给巴基斯坦的经济带来严重打击，而中国此时急需大量棉花。然而，在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了对中国实施“禁运”的决议，这使中国从国际上获得各种物资变得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巴两国各供所有，各取所需，缓解了燃眉之急。1951年，中国已经成为巴基斯坦棉花的第二大进口国，1952年就跃居第一位。^③ 1952

^①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from American General Consul, Dacca to Department of State, No. 129, 13 December 1956, Prime Minister Suhrawardy's Defense of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Box 2711, National Archive II, College Park, MD.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55页。

^③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第一卷：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34页。

年,巴基斯坦对华出口总额为 8200 多万美元,占巴出口总额的 15% 左右。^① 1953 年 3 月 14 日,中巴两国政府签订了棉花协定和煤炭合同,约定年内中方从巴方进口 1 万吨棉花,向巴方出口 20 万吨煤。1955 年,中国又从巴基斯坦购买黄麻、棉花各 2.5 万吨。^② 这一系列的贸易往来对于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使巴方获得了实惠。

根据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的实际情况,中国主动采取措施努力推动中巴关系的发展,其特点是消除疑虑,增强互信,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严守中立。1956 年中国与巴基斯坦两国总理的互访就是中国推动中巴关系发展的重大举措。

二、巴基斯坦对华政策的新变化与苏拉瓦底访华

1956 年以来,巴基斯坦的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1956 年 2 月 23 日,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致电美国国务院表示:“巴基斯坦政府可能希望获得共产党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支持。为了换取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支持,巴基斯坦将推动中国加入联合国。巴基斯坦政府还希望取代印度成为共产党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流渠道。”在同一封电报中,美国使馆还分析了巴基斯坦这一外交新动向产生的原因。美国使馆认为:“首先,中巴关系密切这一动向是与巴基斯坦政府在战术上与苏联集团和解并行的,这是由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南亚次大陆所带来的苏联压力和苏联对美国施加的额外压力所导致的。其次,巴基斯坦政府可能希望扩大与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特别是黄麻纤维贸易,并使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棉花稳定的而不是时断时续的市场。”^③

从 1956 年 9 月开始担任巴基斯坦总理的苏拉瓦底的个人政策倾向也值得我们关注。1956 年 9 月 27 日,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苏拉瓦底所在的政党——孟加拉人民联盟对美国与巴基斯坦的武器

^① 林良光、叶正佳、韩华:《当代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119 页。

^②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第一卷: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134 页。

^③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from American Embassy, Karachi to Department of State, No. 610, 23 February 1956, Closer Communist Chinese-Pakistan Relations,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Box 2716, National Archive II, College Park, MD.

协定以及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苏拉瓦底虽然能够制衡对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批评，但是，只要他仍然是孟加拉人民联盟的领导人，他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步骤来消除有关巴基斯坦是西方傀儡的批评。巴基斯坦将更加难以对付，并更加独立自主。苏拉瓦底已经清楚地表明，巴基斯坦希望成为所有国家的朋友，欢迎来自任何方面的经济援助。一个显示巴基斯坦独立性的可能领域就是与苏联和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联系。”^①

目前，由于档案的缺乏，中国邀请苏拉瓦底访华的决策过程还不太清楚，但苏拉瓦底就任巴基斯坦总理后巴对华政策的积极变化是促成此次访问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是确定的。1956年10月18—29日，苏拉瓦底应邀正式访华。10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会见苏拉瓦底。毛泽东主要就中巴双边关系、巴基斯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印两国关系等问题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在会谈一开始毛泽东就表达了中国对巴基斯坦的良好意愿。他说：“我们是邻国，两国之间有共同的边界。我们愿意看到你们的事情办好，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随后，毛泽东谈到了中巴关系的症结，即巴基斯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问题。毛泽东表示，美国到亚洲搞了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是中国很不高兴的。这个条约使其南北两边的国家都害怕。如果没有这个条约，情况会更好些。毛泽东强调：“中巴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我们知道巴基斯坦不会利用这个条约来打我们。”苏拉瓦底再次辩解巴基斯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为了对付印度。毛泽东说：“你们两国之间争执的问题，主要靠你们两国自己去谈判解决，我们作为友好的国家可以帮助，但是只能是非正式的，不能作正式的调停。”^②毛泽东的谈话确定了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不介入的中立立场。

10月22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苏拉瓦底，对于巴基斯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表示了谅解的态度。他说：“我们原来希望你们

^①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from American Embassy, Karachi to Department of State, No. 205, 27 September 1956, Prime Minister Suhrawardy and the Awami League on Foreign Policy,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Box 2711, National Archive II, College Park, MD.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第三卷：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14页。

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毛泽东着重分析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对中国造成的战略压力。他说：“我们并不怕参加这两个条约的亚非国家，而是怕美国 and 英国。你知道我们身上背了多大的压力吗？单单在日本，美国就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南朝鲜、台湾地区、菲律宾、南越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很大。”^①毛泽东两次会见苏拉瓦底的谈话首先充分体现了这一阶段中国对亚洲国家政策的要义，即通过求同存异的方式来消除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和担心，促使这些国家理解中国的战略处境与外交政策。毛泽东的谈话也表明，中国对巴基斯坦有战略上的信任，不认为巴基斯坦会进攻中国。中国所希望的是巴基斯坦不要加强美国的军事同盟，从而减轻中国承担的战略压力。

在苏拉瓦底访华期间，周恩来也多次与他举行会谈，着力消除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担心，主要目的仍然在于防止巴基斯坦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周恩来说：“我们曾受过殖民主义的祸害，我们也看到了殖民主义的失败，我们怎能走殖民主义的老路去侵略人家呢？这是我们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所不许可的。”周恩来还谈到：“认为中国一发展，一定是帝国主义，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的强大和发展，而是要看这个国家的政策和制度是否威胁人。”^②以上情况说明，按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要求取信巴基斯坦是周恩来与苏格拉底会谈的出发点和归宿。

还应该提到的是，周恩来在会见苏拉瓦底的过程中谈到了许多中美关系的话题。周恩来的谈话主要是为了通过第三国渠道表达与美国和平共处的真诚愿望。周恩来对苏拉瓦底说：“中国持续不断地寻找现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与美国之间的争端，但美国方面有意拖延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拒绝达成任何缓和或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协议。”周恩来强调中国政府永远也不会同意“两个中国”的主张。他说：“紧张局势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武装侵占中国的领土如台湾、金门和马祖。”周恩来最后对苏拉瓦底说：“我们请你告诉你的美国朋友，我们愿意和他们友好相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第三卷：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1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29页。

我们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并伸出我们的友谊之手。让我们看看你是否能够在我们之间带来相互理解。”苏拉瓦底在1956年12月周恩来访问缅甸期间把上述周恩来的意见转达给了美国政府。^①

苏拉瓦底访华是巴基斯坦领导人首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领导人进行的战略沟通起到了两点作用，一是确认了双方对彼此的善意，二是巩固了初步建立起来的战略互信。但中巴关系的基础仍不牢固，这使得中国需要再通过外交行动来推动中巴关系的发展。1956年12月，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三、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

1956年12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对巴基斯坦的访问是周恩来对亚洲八国系列访问的一部分。周恩来此次访问巴基斯坦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强调中国的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巴基斯坦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此作为中巴两国的共同点，在两国之间建立战略互信；第二，在巴基斯坦极为关注的克什米尔问题上强调该问题是殖民主义造成的恶果，中国保持中立和不介入的态度。

1956年12月20日，周恩来一行抵达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②12月21日上午，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举行会谈，就中巴关系和克什米尔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说：“中巴两国没有利害冲突，自从建交尤其是在万隆会议以后，通过文化、经济方面的交流和人员的来往，互相学习，友谊有了进一步发展，今后还可以把两国关系搞得更好。虽然两国在某些方面有不同见解，但这不妨碍和平共处。”针对克什米尔问题。周恩来说：“克什米尔纠纷是历史上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希望两国和平解决。印巴两国是姊妹国家，具有共同的血统，只应和好而没有理由互相敌视。”^③周恩来与苏拉瓦底的谈话为此次访问奠定了基调。一方面强调中巴两国可以和平共处，另一方面强调克什米尔问题是英国制造的麻烦，是殖

^① Incoming 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Karachi to Department of State, No. 1643, 12 December 1956,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Box 2568, National Archive II, College Park, MD.

^② 1947—1959年卡拉奇为巴基斯坦首都。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48-649页。

民主义造成的恶果，并不应该归罪于印、巴任何一方，中国只是劝和促谈而不介入。

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出席了卡拉奇市民举行的欢迎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周恩来的演说并不长，其中主要是强调中国需要和平，以此来取信于巴基斯坦，争取巴基斯坦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表示，要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业。不但必须有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还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接着，周恩来含蓄地谈到了克什米尔问题。他表示亚非国家之间的问题几乎都是殖民主义统治所遗留下来的恶果。殖民主义者就是“企图利用这些问题来挑拨、分裂和削弱亚非国家，以便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最后周恩来强调：“我们亚非国家只要相见以诚，我们之间的问题是没有不可以通过彼此和平协商的道路求得解决的。”^①周恩来虽然没有直接指出克什米尔问题，但这明显是阐述了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那就是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都是殖民统治造成的，只要有真诚意愿，矛盾就可以得到解决。

周恩来与苏拉瓦底的会谈和在卡拉奇市民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了苏拉瓦底的积极回应，他认同中巴两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点，那就是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当天晚上举行的宴会上，苏拉瓦底说：“巴基斯坦和中国现在都在进行国家建设工作。我们像你们一样都认为，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我们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②

1956年12月24日，中巴两国总理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由于中巴之间确实还有很多不同意见，所以这项联合声明没有包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该声明只表示：“两国总理认为，他们两国的政治制度的不同和他们对于许多问题的不同见解，并不妨碍他们两国间友好的加强。”^③这相当于表示发展友好关系是中巴两国唯一的共同点。

当天，周恩来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对于克什米尔问题，“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是周恩来的主要态度。周恩来说：“我们希望巴基斯坦和

^① “周总理在卡拉奇市民欢迎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3日。

^② “苏拉瓦底总理盛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两国总理表示永远为世界和平奋斗”，《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3日。

^③ “中巴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 重申加强中巴两国友好关系的共同信念 愿尽力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促进世界和平”，《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5日。

印度能够和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人民曾经很长地住在一起。我们相信这个问题是能够和好地解决的。”一个记者问到中国是否可以帮助巴基斯坦和印度通过会谈来解决这个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对这个问题还在研究阶段。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原则，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①这样就巧妙地避免了中国斡旋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所要面临的困难局面。周恩来并没有因为当时中印关系的密切而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倒向印度，中国这一明智的决定对于发展中巴关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2月28日，周恩来一行来到了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进行参观访问。^②达卡是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的最后一站，也是此行的最高潮和最艰难的阶段。12月29日下午，大约有20万人聚集在达卡大运动场欢迎周恩来到访，并听取他的讲话。周恩来的讲话是此次访巴最重要的政治表态。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比较系统阐述了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的具体内容。周恩来说：“对于我们亚非人民说来，友好团结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有了我们的友好团结就能有助于保证我们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就能医治殖民主义统治所遗留下来的创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进步富强。”这就是说，中国发展与亚非国家关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进行经济建设。周恩来的讲话当然也不能不提到巴基斯坦人所关心的克什米尔问题。他再次表示，亚非国家之间的纷争几乎都是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达成。周恩来的讲话一如既往地强调了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不介入、保持中立的态度。在讲话的最后，周恩来再次含蓄地表达了对巴基斯坦加入西方军事同盟的不满。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和政府是不赞成建立敌对的军事集团的，特别是不赞成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亚非地区建立分裂亚非国家的军事集团的。但是，正如同苏拉瓦底总理和我五天以前在卡拉奇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所重申的一样，这些分歧不应该妨碍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的加强。”^③

当天，在乘坐轮船进行参观游览时，巴基斯坦记者再次就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态度向周恩来提问。周恩来仍然重申自己在卡拉奇的表述，那

^① “周总理在卡拉奇答记者问 相信克什米尔问题能和好解决 并谈及我国对中美关系等问题的立场和意见”，《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6日。

^② 此时，东巴基斯坦尚未独立成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③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年12月31日。

就是中国仍然在研究这个问题，现在不能发表任何意见。这种回答显然没有让当时在场的记者感到满意，接着巴方记者又提出了更加尖锐的问题。此前周恩来在访问印度的过程中曾于11月29日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说。在演说中周恩来曾表示：“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也可以相信，在你们为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会永远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全力的支持。”^①因此，巴基斯坦记者问周恩来，他在新德里向印度人表态的对印度保卫领土完整的支持是否也适用于巴基斯坦。周恩来巧妙地回答说，他在新德里所说的这种支持一般地适用于所有亚非国家。而且这种支持来自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②

在访问结束后，1957年2月，苏拉瓦底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讲话时就申明：“我完全肯定，关键时刻中国会帮助我们。”同年年底，巴基斯坦新任总理费罗兹·努恩强调：“对巴基斯坦来说，中国的友谊是力量的源泉，从来不应忽视。”^③就是美国也无法否认周恩来此次访巴的成功。1957年1月8日，美国驻达卡总领事馆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总领事馆认为周恩来的访问是中国共产党在公共关系方面的高度成功。……一些巴基斯坦的观察家把周恩来称作是一位反对资本主义的斗士、一位反对资产阶级的斗士、一位反对殖民剥削的斗士。”^④

后来的事实说明，1956年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总理互访之后，中巴关系开始逐渐走上发展的正轨，两国的友好合作得到了加强。这首先表现在巴基斯坦内部开始反思西方主导的军事同盟和美国对巴的经济援助。1956年7月，巴基斯坦设立了外援调查委员会，专门对美国给予巴基斯坦的援助情况进行调查。该委员会于1958年8月向巴政府提出报告指出：“特别的外援过了必要的最短时期以后不应该再继续。”应该使巴基斯坦的生产逐步能够满足目前国内的消费需要，并进一步促进巴国内经济发展的水平。^⑤

① “周恩来总理在印度国会的演说”，《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日。

② “周总理谈访问巴基斯坦的收获”，《人民日报》，1956年12月31日。

③ 林良光、叶正佳、韩华：《当代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

④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 from American General Consul, Dacca to Department of State, No. 140, 8 January 1957, CHOU EN-LAI'S Visit to East Pakistan, December 28-29, 1956, RG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1955-1959, Central Decimal File, Box 209, National Archive II, College Park, MD.

⑤ “巴基斯坦尝够美‘援’滋味”，《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

这说明巴基斯坦正在试图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在经济发展上实现独立自主。其次，巴基斯坦改变了在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的立场。1961年12月15日，在第16届联合国大会表决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时，巴基斯坦改变了8年来追随美国的态度，对苏联提出的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投了赞成票。第三，巴基斯坦对中国最为关切的巴加入军事条约组织的问题澄清了态度。1962年3月19日，巴基斯坦外交部正式就巴参加军事条约问题向中国提交备忘录。备忘录表示“巴基斯坦参加几个条约的目的纯粹为了自卫，这不是针对巴基斯坦切望与之加强友好关系的伟大邻邦中国的，也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的”。^① 1963年3月2日，中巴两国又妥善解决了中国与巴控克什米尔之间的边界问题，为中巴关系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中巴关系不断紧密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四、对新时期中巴关系的启示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发展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实践在中国外交战略和思想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启示。

首先，我们应从突破美国封锁围堵，确保中国西南部地缘政治安全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重要性，使巴基斯坦成为中国西南部地缘政治安全的支点。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形势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东亚冷战有某些相似之处。1953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之后，根据其冷战性质的判断，不断强化在亚洲地区的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其主要目的是构建遏制中国的军事包围圈。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于2017年开始提出“印太战略”的概念。拜登政府执政后，从外交、经济和军事多个方面立体推进“印太战略”，其主要目的之一也是要制衡、围堵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巴基斯坦是美国对华军事包围圈的支点国家。中国站在突破美国的封锁、改善中国的周边环境的高度来看待中巴关系。中国认识到巴基斯坦参加两个西方的军事同盟并不是对中国怀有敌意，巴基斯坦在外交上希望独立自主，不想充当美国冷战的“炮灰”。因此，尽管美巴之间是结盟关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第二卷：1957—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系，中国仍然通过两国总理的互访基本扭转了中巴关系低迷的情况，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构筑的“铜墙铁壁”上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巴基斯坦逐渐从美国遏制中国的支点变成了中国维护周边环境稳定的支点。目前，美巴两国关系时起时伏，矛盾频发，而中巴两国的共同利益已经远远超出了60多年前的水平，这些共同利益包括中巴两国深度的战略互信、“中巴经济走廊”给巴基斯坦带来的切实收益、中巴两国对于维护南亚和平与繁荣的共同利益、中巴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一致看法等等。基于以上因素，巴基斯坦仍然可以成为中国在西南方向冲破美国围堵的重要突破口。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结束后不久，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022年11月1—2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结束后，在两国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中，巴方表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台湾、南海、涉港、涉疆和涉藏等问题上支持中国。”^① 巴基斯坦对于中国核心利益的支持一方面说明中国通过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中国在西南方向打通了一条突破美国遏制的通道，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伙伴。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仍然应从打破美国地缘封锁的安全角度来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

其次，我们要善于寻找和扩大中巴两国的共同利益，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如前文所述，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找到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克服了巴基斯坦参加反华军事同盟的障碍。201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时提出，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以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合作布局。“1+4”的合作布局实际上在中巴两国形成了一条合作的“巨龙”，瓜达尔港是“龙头”，“中巴经济走廊”是“龙身”。在此基础上，我认为中巴合作可以有三个新的增长点。1. 将瓜达尔港建成中巴自由贸易港和宜居的海港城市；2. 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巴经济走廊”未来的发展方向；3. 充分发挥“中巴经济走廊”的“外溢作用”，使中巴经济走廊在政治、文化、社会、党际交往等方面成为展示中国国际形象的舞台。

中巴两国在瓜达尔港的合作对于中国在西南方向打通出海通道，保障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2年11月3日。

我国能源安全，促进中国的远洋运输，使中国走向更加广阔的海洋，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等都具有战略价值。2016年9月3日，瓜达尔港自由区奠基仪式举行。^① 未来可考虑将瓜达尔港建设成中巴自由贸易港，使境外货物、资金能够自由进出的瓜达尔港。对进出港区的全部或大部分货物免征关税，并且准许在瓜达尔港区内开展货物自由储存、展览、拆散、改装、重新包装、整理、加工和制造等业务活动。如果这一计划能够实现，将为中巴两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经贸往来提供新的动能和舞台。在港口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未来可考虑在瓜达尔港附近建立一个宜居的城市，例如因地制宜，选择适当地点尝试建设住宅、商业文化设施、城市道路、上下水设施、网络通讯设施等，使得瓜达尔港可以发展旅游业，最终实现瓜达尔港全面均衡的发展。

目前，“中巴经济走廊”在基础设施联通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下一阶段，中国应当把绿色能源、绿色农业等项目作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新领域，把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目前，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2021年10月，“一带一路”热带干旱经济林工程和技术研究中心在瓜达尔港自由区成立，目前已经开始种植试验田。^② 2022年7月“中巴经济走廊”首个水电投资项目——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全面投入商业运营。该项目装机容量达72万千瓦，每年可向巴基斯坦提供32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当地约500万人用电需求。^③ 未来，中国如果能将风能、太阳能、绿色栽培、节能减排、绿色低碳等技术项目引入“中巴经济走廊”，不仅将为“中巴经济走廊”注入新的活力，也将为“一带一路”建设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树立良好的形象。

中国还应当充分发挥“中巴经济走廊”的“外溢作用”。中巴经济走廊虽然主要关注基础设施、经贸往来等领域，但它仍然可以在政治、文化、社会、党际交往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首先，“中巴经济走廊”是开放包容的平台，中国应当欢迎对“中巴经济走廊”感兴趣持善意的第三国加入到建设之中。2021年5月，中巴经济走廊网络研讨会在印度尼西亚举

^① 徐伟：“中巴经济走廊系列项目推进顺利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自由区举行奠基仪式”，《人民日报》，2016年9月3日。

^② 程是颀：“为瓜达尔港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人民日报》，2022年6月12日。

^③ 程是颀、唐鹏飞：“中巴经济走廊首个水电投资项目全面投入商运”，《人民日报》，2022年7月3日。

行。在会议上印尼海洋和投资统筹部副部长赛托表达了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与中国和巴基斯坦开展经济合作的愿望。^①邀请第三国参与建设可以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问题上的开放胸襟，消除亚洲国家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意图的某些误解和担忧。同时，中国应围绕“中巴经济走廊”开展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交流。截至2020年8月，“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已经举行两次会议。截至2022年6月，“中巴经济走廊”媒体论坛也已举行七届。未来可以考虑组织青年、妇女、法律工作者、艺术家、智库等会议机制，使“中巴经济走廊”不仅成为一条经济“大动脉”，也可以成为展现中国和平外交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舞台。

第三，我们须谨慎处理影响中巴关系发展的外部因素，即美巴关系和克什米尔问题。

对于美巴关系，中国不应以美巴关系的亲疏变化来决定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如前文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又同时参与两个遏制中国的军事同盟的情况下，中国仍然通过总理互访等形式大力发展中巴关系。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反恐战争、核武器等问题上对巴基斯坦提出批评，引起巴方的强烈反应。但2022年初，巴基斯坦编制的《国家安全政策2022—2026》中仍认为美巴关系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非常关键。^②未来不能排除美巴两国再次走近的可能，但我们也应看到巴基斯坦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对巴政策有深刻的认识。不管美巴关系如何起伏变化，中国不打“巴基斯坦牌”，只是真诚地帮助巴基斯坦进行各方面的建设，这一点不应该动摇。

对于克什米尔问题，中国在20世纪50、60年代一直保持中立和不介入的态度。在1956年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时，中国并没有因中印关系的密切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倒向印度。在中印边界爆发武装冲突后，中国也没有因此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倒向巴基斯坦。今天，中巴关系不断发展深入，而中印关系面临较为严峻的局面。但是，中国仍然应该继续保持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公正中立的立场，力促印巴两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而不能实

^① 徐伟：“中巴经济走廊网络研讨会在印尼举行——探讨三方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5月4日。

^② 王旭、林一鸣：《大变局中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南亚研究》，2022年第2期，第33页。

际参与斡旋和调解工作。在中巴两国的共同文件中，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了这种立场。今年11月初，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结束访华时在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中指出：“中方重申，克什米尔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争议，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相关安理会决议以及双边协议，以和平方式加以妥善解决。”^① 谨慎处理克什米尔问题，不仅有利于中巴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四，我们应通过外交理论创新来引导中国与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外交理论创新与外交实践必须形成良性互动。

1956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时曾经着重阐述了“中间地带”理论。该理论突出了亚非国家在冷战格局中的重要战略价值。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推动中巴关系发展的实践归根结底是“中间地带”这一外交理论创新的具体落实。中国目前面临的复杂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创新外交理论，以理论带动实践，从而改善中国的周边关系。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② 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③ 在“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和“中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中巴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中巴两国高层互访的势头没有因新冠疫情中断。2022年2月，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来华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巴新任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通电话。11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访华。在经贸领域，据巴方统计，中国自2015财年起连续6年成为巴基斯坦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④ 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向外国免费提供新冠疫苗是从巴基斯坦开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2年11月3日。

^② 习近平：“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97页。

^③ 习近平：“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2015年4月21日，人民网，2015年4月22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422/c40531-26883884.html>，2022年10月22日。

^④ “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6月，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308/sbgx_676312/，2022年10月22日。

始的。2021年2月1日，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首批50万剂新冠疫苗运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①中国军队向外军提供新冠疫苗也是从巴基斯坦开始的。中国国防部于2021年2月7日宣布，中国军队新冠疫苗首批对外援助的国家分别是巴基斯坦和柬埔寨。中国军队援助这两个国家的新冠疫苗分别于2月7日和2月8日抵达两国首都。^②“危难之处显身手”正是“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具体体现。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之后，中巴关系发展并不顺利，主要症结在于巴基斯坦同时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并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但中国准确把握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亚洲地区形势的主要矛盾，制定了化解这一矛盾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1956年中巴两国总理的互访就是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表现。在互访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只是委婉表达了对巴基斯坦加入两个反华军事同盟的不满，同时也对巴基斯坦的选择表示谅解。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巴两国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建设，因此互不构成威胁。在巴基斯坦极为关注的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坚持不介入的中立态度，并力促巴印两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问题，而不要受西方国家的挑拨。1956年中巴两国总理的互访初步扭转了中巴建交以来关系发展不顺畅的局面，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巴关系的根本改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当下中巴交往带来诸多重要启示。

① 丁雪真：“中国政府首批对外援助新冠疫苗转交巴基斯坦”，《人民日报》，2021年2月2日。

② 刘博通：“中国军队向巴基斯坦军队、柬埔寨军队紧急提供新冠疫苗”，《人民日报》，2021年2月9日。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has widened, and the role of geo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outh Asia and the intensified great power strategic competition. Strength against strength is the core approach for India to deal with security dilemmas. Therefore India promotes the New India Strategy to strengthen economic strength and military capacity building, steps up its policy towards neighboring countries, launches the Indo-Pacific Ocean Initiatives, and deepens strategic coordin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Australia within the Indo-Pacific framework, and advanc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Quad. It can be predicted that India's security dilemma towards China is a long-term phenomenon, and India's China policy will always b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On the Practices and Enlightenment of China's Promotion for Developments
of China-Pakistan Relations in the mid of 1950's Reviews Centered on
Chinese and Pakistan Premiers Exchange Visits in 1956

Li Qianyu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had not developed smoothly. The main reason was Pakistan joined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 and Baghdad Pact, the two military alliance systems dominated by Western Powers. Confronted with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based on the spirit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China dedicated to develop good-neighboring relations with Pakistan. On October, 1956, Pakistan Premier Suhrawardy visited China. During his trip, Chinese leaders expressed understanding to Pakistan's decision to join SEATO and Baghdad Pact, reiterated that China would never carry out external expansions. On December, 1956, Chinese Premier Zhou Enlai visited Pakistan. During his trip, Zhou repeatedly stressed that China needed a peacefu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economic construction. For the issue of Kashmir, on one hand, China adopted a policy of non-intervention,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sincerely hoped that Pakistan and India could solve the problem through a peaceful consultation, and be aware of imperialist countries'

provocations. The history of China-Pakistan Relations in 1950's brought some enlightenments on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thoughts: The importance of China-Pakistan relations must be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U. S. blockade and ensuring the geopolitical security in Southwest of China; we must be good at finding and expanding the common interests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and constantly inject new impetu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We must carefully handle the extern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Pakistan relations, namely, the US Pakistan relations and the Kashmir issu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cluding Pakistan, must be based on innovations of diplomatic theori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 India and Its Experi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Ma Degong & Xiao Jinjie & Zhong Peng

Since the 21st centu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India has explored a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path with unique Indian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to create a national biometr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build a "JAM" trinity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system, encourage (reduce cash and widely use)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transactions, and develop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The Indian government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seeking to extend digital finance to the poorest sectors of society and to eliminate the digital gap between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ia has adopted innovative new experience measures such as unified payment interface, development of self-help organizations (SHGs), adoption of business agency (BCs) model,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incorporating it in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hich are worth learning and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